

汉字·词汇·语用探索

HANZI CIHUI YUYONG TANSUO

马叔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汉字·词汇·语用探索

HANZI CIHUI YUYONG TANSUO

马叔骏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词汇·语用探索/马叔骏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19-2752-6

I. ①汉… II. ①马… III. ①汉字—研究 ②汉语—词
汇—研究 ③汉语—语用学—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431 号

书 名: 汉字·词汇·语用探索

责任编辑: 徐 雁

封面设计: 张 静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48/3591/3651

编辑部 82300090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4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2752-6/H·10116

定 价: 42.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前 言

在语言学研究乃至一般人文科学研究中，总会遇到一组组二元对立的现象：传统与现代、共性与个性、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广义与狭义……这些对立概念，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理论研究视角；既是范畴归类，也是方法分野。这些对立的观念或范畴并不是决然水火不相容的，在研究中也是可以加以综合的。总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对立概念体现了不同的研究思路。

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为标记的，一般认为之前的语言研究为语文学（philology）。就我国而言，传统语文学即“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没有语法；而在西方传统语文学中，语法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学者必须具备的“七艺”（seven liberal arts）之一^[1]。由此可见，语言学与语文学就研究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完全分割开的。传统“小学”包含的汉语文字、词汇、语音诸语言要素，研究路子当然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径庭。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虽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也难做到绝对不相往来，尤其是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例，与一般的语言教学不同，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因素除语音、词汇、语法之外，还要加上汉字，汉字“一直被看作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2]，也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瓶颈，如何教授汉字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难点。汉字教学必然牵涉到汉字学，汉字学与汉字教学如何接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一线的对外汉语教师提出了很多意见、想出了很多办法，如强调对外汉字教学应注重结果而不要纠缠过程，就是不要在乎学生的书写笔顺；教学中为便于学生记忆随意拆解汉字……面对这种情况，有专家强烈反对这类“戏说汉字”的做法，要求按文字学规范进行教学，坚决维护正字法。实际上，无论在语文学研究还是在语言学研究中，“正”与“俗”、“体”与“用”的矛盾一直就存在，此消彼长。汉字学之外有“俗汉字学”，是“正”与“俗”的关系，也关乎“体”与“用”。“存在就是合理”可能有偏颇之

处，但“存在可能因为有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代语言学可以分为普通语言学和专门语言学，后者以某种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如汉语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不以某种具体语言为对象，研究一般语言现象的性质、规律、结构，等等，着眼语言的共性，于是语言学研究就有“普遍语法”之类的说法。对应到宏观微观，普通语言学宏观研究就会比例高，反之，专门语言学微观考察就会多，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在具体或局部问题上两种方法都会用到。专门语言学，像汉语语言学，以汉语言为对象，自然以汉语的个性为主要观察角度，而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是汉字，这就注定汉语的很多特性与非拼音文字的汉字特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的构词、句法等结构方式都与汉字有关。汉字作为汉语的语素组合排列在一起，并不是简单平列。我们认为四个意义接近的汉字组合成一个短语，其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很微妙的，可能会呈现出多种层次。这些是将汉语的本来面貌描写清楚的重要内容，也可能是印欧语言所不具备的。同样，在汉语篇章语用上，因为汉字的特殊性，也造成汉语篇章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特点，无论是话语结构方式、组织特点还是表达方式，都具有鲜明的汉语特色。

语言学研究既具有人文科学研究的一般特点，也与一般人文科学研究有一定区别，它带有自然科学研究的某些特征。人文科学研究总会打上时代特征的烙印，语言学研究也不能免俗。一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颇为时髦，但认定“语言学就是世界的”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真理。语言学作为一门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学科，应该具有自然科学严密的思辨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上述传统与现代、共性与个性、宏观与微观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关系，真正做到语言学研究的“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理念，对汉语语言学进行了一些探索。

注释

[1] 王福祥、吴汉樱，2008，《语言学历史·理论·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2。

[2] 赵金铭，2004，《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413。

目 录

汉 字 篇

第一章 俗汉字学

- 第一节 俗汉字学界说 2
- 第二节 俗汉字学的形成 4
- 第三节 俗汉字学的内容及其应用 8

第二章 中日汉字使用情况比较与统一简化字

- 第一节 汉字字量与日文汉字 19
- 第二节 中日汉字使用情况比较 21
- 第三节 “统一”简化汉字的问题 26

词 汇 篇

第三章 几种四字格短语的结构与语义

- 第一节 “诟谇谣谚”之类的语言结构 30
- 第二节 异形成语解析 38
- 第三节 “溜之乎也”等短语结构分析 49
- 第四节 “×而×之”格式结构与减缩问题 55
- 第五节 “爱屋及乌·莺飞草长”类成语的语义与结构 60
- 第六节 成语语序与意义 64

第四章 词语语义及辨析

- 第一节 关于“多少” 68
- 第二节 “乳臭”及其他 73
- 第三节 量词的量和质 76

第五章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述评

- 第一节 汉语外来词的范围问题 91
- 第二节 汉语外来词的译借方式 93
- 第三节 外来词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98
- 第四节 外来词的规范化问题 100

第六章 字母词语知晓度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09
- 第二节 结果与分析 113
- 第三节 结果及讨论 127

语 用 篇

第七章 汉语修辞学的现状及走向

- 第一节 经典修辞学体系 130
- 第二节 修辞学体系的探索 137
- 第三节 汉语修辞学的走向 143

第八章 语境

- 第一节 语境的概念 149

第二节 语境的原则 153

第三节 语境的功能 161

第九章 话语结构

第一节 话语的概念 165

第二节 话语的单位 170

第三节 话语结构模式 176

第十章 话语组织的原则

第一节 连贯原则 189

第二节 和谐原则 202

第三节 经济原则 211

第十一章 话语组织的方法

第一节 话题导入的方式 221

第二节 话语衔接的手段 229

第十二章 汉语的特点与语言的表达

第一节 汉语语序的灵活性 243

第二节 汉语的表达特点 247

第十三章 公关语言质朴清新的风格

第一节 质朴 254

第二节 清新 258

后 记 262

汉字篇

第一章 俗汉字学

第一节 俗汉字学界说

文字学属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汉语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也称汉字学。汉字学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广义的汉字学包括汉字形体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即宋·王应麟《玉海》和清《四库全书》所称的“小学”类。狭义的汉字学则相当于文字形体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字的性质、结构、形音义的关系及发展规律。汉字学对汉字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研究重在科学性，它所揭示的规律具有客观性、系统性、理论性和可信性。它对诸如某字的结构等问题的解释必须佐以大量的同类事实材料，系统地论述，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断。例如《说文解字》关于“木”“本”“末”“束”“林”“森”等字的解释：

木 《说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王筠《说文释例》：“木固全体象形字也。|象干，上扬者枝叶，下注者根株。”

本 《说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以在其下。”徐锴《说文系传》：“一，记其处也，与末同义，指事也。”

末 《说文》：“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木杪曰末。故于木上作画，指事。”

束 《说文》：“束，缚也。从口，木。”徐锴《说文系传》：“束薪也。”

林 《说文》：“林，平土有丛木曰林。从二木。”王筠《说文释例》：“林从二木，非云只有二木也，取木与木连属不绝之意也。”段玉裁注：“竹木生平地曰林。”

森 《说文》：“森，木多貌。从林从木。”

“木”本树的象形并佐以“本”“末”“束”“林”“森”等字，是有系统的论证，在系列材料的分析之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具有可信性。当然，其中也会有若干分歧，但并不影响结论的得出，如“森”字就有不同的解释，许慎说是“从林从木”，王筠却说是“三木”，王筠《说文系传校录》据《一切经音义》改为“多木长貌也”，并注：“言多者，三木也；言长者，木出林上也。”话又说回来，使用汉字的人并不一定是文字学家，他们对汉字、尤其是汉字结构的理解并不都符合汉字的客观结构。事实上，非文字学家对汉字结构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掺杂在一起的，正确与否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他们掌握汉字、使用汉字。对汉字的结构、性质等方面的非科学的理解与使用就构成俗汉字学。俗汉字学与汉字学的关系一如俗词源学与词源学的关系：“词源学的目的就在于一个一个地探讨一切词的现状、来源和历史上的演变过程”，“词源学的研究必须依据语言的发音去追求一个词的来源”；“应用语音的相同，依据语音的联结而去胡乱推测词的来源，没有任何历史上的科学证明，语言学家管它叫通俗词源学”^[1]。俗词源学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只依语音相似就推测词源；俗汉字学同样不对字的形音义进行历史的、有充分材料依据的科学考证，仅依靠对字形的主观臆断进行分解，这二者同样都缺乏论证的科学性而以主观臆测为中心。

俗汉字学与汉字学是人们在汉字认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孪生兄弟。从

汉字学建立那一天起就产生了俗汉字学，在以后的发展中二者始终相随，可以说是伴生共存。没有汉字学就没有俗汉字学，有汉字学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俗汉字学。汉字学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的论证基础之上的，在走向科学的、历史的论证中必然会出现非科学的、非历史的认识。这既是汉字学与俗汉字学的相互关系，也是二者的分野。

第二节 俗汉字学的形成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对汉字的关注。除了“仓颉作书”之类的传说以外，有文献记录的就有“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五人为伍”（《国语·齐语》、《周礼·夏官》）、“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等分解汉字形义结构的说法。到了汉代，刘歆的《七略》（见《汉书·艺文志》）、郑众的《周礼注》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才算建立了以汉字形体结构为主的文字学。几乎就在探索科学的汉字学的同时，也伴生了俗汉字学。《说文解字·序》说：“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神妙究洞圣人之微旨。”这一方面说明许叔重写《说文》的一个动机是匡正“俗儒鄙夫”的谬说，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已存在许多不“通学”的“野言”谬说，这“野言”谬说大概就属俗文字学之列。许慎在《说文·序》中提到的汉代今文经学家纬书（如《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中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都是俗文字学解说实例，他以“长，久远也，从兀从匕，亼声”，“斗，十升也，象形有柄”，“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如大擘指，象其卧形”的解释，建立了科学的文字学解释，从而取代了纬书中的俗文字学解释。这正说明汉字学与俗汉字学相互依赖的关系。

俗汉字学与汉字学结伴而共生，具体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下列一些原因。

1. 对汉字结构的探索本身要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能一次性地正确解释全部汉字的结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望“文”生义的主观臆测。《说文解字》尽最大努力去正确解释每个汉字的结构，匡正“俗儒鄙夫”的谬说，然而它本身也未能避免出现新的错误，诸如：

止 《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𡳿，故以止为足。”

朱骏生《说文通训定声》：“止部文十四，亦无一涉草木者，当以足止为本义，象形也。三出者，止之列多略不过三。”许误。

奔 《说文》：“奔，走也，从夭贲省声，与走同意，俱从夭。”

林义光《文源》：“按奔非声……象足迹，疾走故迹多。”许误。

鬥 《说文》：“鬥，两士相对，兵仗在后，象鬥之形。”商

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卜辞诸字，皆相二人相搏，无兵杖也。”许误。

𤝵 《说文》：“𤝵，母猴也，其为禽好爪，下腹为母猴形。”

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古今文及石鼓文从爪象，绝不见母猴之状。”许误。

俄 《说文》：“俄，行顷也，从人我声。”张政烺《释甲

骨文俄、隶、蕴三字》^[21]：“左边是大，象一个人形，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件类似锯子的工具在割这个人的腿。”许误。

历史上误入俗文字学的也并非只许叔重一人，宋·王安石所著《字说》由于有许多错误解释，就很受学者们的奚落。冯梦龙《古今谭概·塞语》说：“王荆公作《字说》，穿凿杜撰，刘贡父又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也。’贡父笑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并无以答。”此事无从查考，但“坡为土皮”“滑为水骨”确为俗文字学之显例。

2. 对字的结构分析受到文献资料的限制

汉字形体资料的搜集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人们分析字的结构，总是要寻求原始文字资料，而所谓最早的字却只有依靠出土文物来确认。1899年以前，金文被认为是最早的汉字，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取代金文成为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但我们很难说没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汉字。《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形体依据的，有些字小篆的写法和甲骨文不一样，依小篆字体分析字的结构得出一种结论，依甲骨文字体可能得出另一种结论，许慎的一些错误就与此有关。假如许慎看到甲骨文“止”“奔”“爲”等字的写法，就不会出现将“止”解为“草木出”，将“奔”解为“奔声”，将“爲”解为“母猴”的错误了。后人能纠正《说文》的错误，重要原因是看到了许慎没能看到的文字资料。许慎能正确地解释“田”和“力”，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男”。《说文》说：“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是对的；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却不准确。甲骨文“男”，字像人操耒而耕，并无“力”形。许慎据以分析的“男”是小篆，没看到甲骨文，自然就成了“从田从力”，况“男用力于田”也勉强说得过去，可以附会的。同样，许慎如能有甲骨文作依据，就不会将“鬥”解作“两士相对，兵杖在后”，将“须”解作“从页从彡”，将“多”解作“从重夕”，将“爰”解作“从爰从于”。假如有一天，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被发现，人们也许会对某些字作出新的解释。

3. 汉字在发展中形体的变异，直接影响人们对汉字结构的认识

汉字的异体、别体就是形体变异的反映，依据不同的字体，结构分析的结果就会有差异。《说文解字》中有一些依篆体结构而写的字，与后世通行的别体字就明显不同，下以大徐本《说文解字》为例：

○ “覆也，从一下垂也。臣铉等曰：今俗作冪。”

市 “釋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诸侯赤，大夫葱衡。从巾象连带之形。臣铉等曰：今俗作紱，非是。”

沱 “江别流也，出岷山东别沱，从水它声。臣铉等曰：沱冶之沱通用，此字今别作池，非是。”

愒 “息也，从心曷声。臣铉等曰：分别作憇，非是。”

𦣻 “低头也，从页逃省。臣铉等曰：𦣻首者逃亡之貌，故从逃省，今俗作俯，非是。”

上例“厶”与“冪”、“市”与“紱”、“沱”与“池”、“愒”与“憇”、“𦣻”与“俯”均为同字异体。依形体结构分，则“厶”为象形，“冪”为形声；“市”为象形，“紱”为形声；“沱”为“它”声，“池”为“也”声；“愒”为形声，“憇”待解；“𦣻”为会意（按《说文》解），“俯”为形声。这些字的结构分析，离开所依据的字的形体，难论孰是孰非。

简化字也属此列。汉字在形体演变中有简化，也有繁化，不过前者是主流。简化字是群众在用字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原先就规定好了的原则，再根据它统一简化。简化字很难纳入一个或几个统一的模式。人们对已简化了的字再进行结构分析，比之对简化前的字进行结构分析要难得多，有的甚至根本无法进行。比如繁体“動”字，《说文》说是“从力重声”，形声字，那么简化字“动”是什么呢？繁体“獻”字，《说文》说是“从犬虬声”，那么简化字“献”是什么？繁体“聶”字，《说文》说是“附耳私小语也，从三耳”，是会意，那么简化字“聂”又是什么？这些简化字形声不是形声，会意不是会意，能分解却分解不出道理来。若强作解释，硬说“献”是南方送来的犬，“聂”是一个又一个耳朵，难免堕入俗汉字学的迷雾之中。

4. 人的因素

由于当事人本身的文字学修养层次不同、观察角度不同，以及时代变迁带来的思想认识变化也会造成字的分解的差异。凡使用汉字的人，时间一久，自

然形成分解汉字的习惯，甚至连外族人也不例外。分解汉字是共同的，怎样分解却不一定相同。汉字知识深些的人和具有一般汉字常识的人，对一部分字分解一致，对另一部分分解却不一致。例如懂文字学的会把“章”字分解为“音”“十”，因为《说文》说：“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而一般人却只作“立”“早”分解，如问人姓“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之类。分解汉字大体有三个层次。一是懂文字学的人；二是只凭主观推测，想当然地联系字形和字义，不作深一层的考察；三是不考虑字的形体与意义的联系，单纯凭字形分解。三个层次的人，对一般汉字分解可能是一致的，如大家熟悉的偏旁、部首和通用独体字的组合，如“明”为“日”“月”的组合，“林”为二“木”的组合，“吗”为“口”“马”的组合，等等。第一层次的人，可以知道“章”为“音”“十”，“年”（秊）为“禾”“千”，“香”（𦵏）为“黍”“甘”，“兼”（𦵏）为“又”二“禾”，“赖”（賴）为“贝”“刺”。第二层次的人，可以知道“闯”是“马”在“门”中，“酒”是“水”加“酉”，“盛”是“皿”义“成”声，“把”是“手”义“巴”声，却不一定知道“炙”是“火”和“肉”，“鲜”是“鱼”和“羹”（羊），“疆”是“土”和“彊”（强）。第三个层次的人，只能做到单纯分解，而不一定考虑什么意义，如将“明”分为“日”“月”，将“品”分为三“口”，将“星”分为“日”“生”，将“冀”分为“北”“田”“共”。其中有分对的，也有分错的，是否符合文字学，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二、三两个层次固然会出现许多属于俗文字学范围的事例，就是在第一层次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第三节 俗汉字学的内容及其应用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俗汉字学脱胎于汉字学，又不同于汉字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应用范围。俗汉字学的研讨内容 and 应用范围主要有：俗汉字学独立于汉字学、俗汉字学与识字教育、俗汉字学在汉语中的影响等。

1. 俗汉字学独立于汉字学

不可否认，俗汉字学的出现与汉字学的发展有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俗汉字学是汉字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俗词源学独立于词源学，它不像词源学那样研究个别词可以考知的最早的意义和最早的形式以及后来的演变，但俗词源学的研究同词源学一样，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俗汉字学也有与之相类似的地方。

首先，俗汉字学不考求汉字最早形体，即不追究字源。每一时期的俗汉字学都以当代熟知的字体作为分解的对象而不考究字的历史演变。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有一段写吕洞宾：

- ① 游遍天下，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今汝姓吕，即其人也。……从此混迹尘途，自称为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吕字。

将“吕”“回”二字分解为二“口”组合并不合于字源。《说文》说：“回，转也，从口，中象回转型。”甲骨文、金文均作一笔回转型，只小篆作二口形。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认为“此当是云之借字”，“象云气之回转，因取其意”，“遂反之而用为回也”。《说文》说：“吕，脊骨也，象形。”甲骨文、金文中吕字中无连笔，小篆有连笔。根据楷书将“回”“吕”均作“二口”，属从俗解。又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写“十八兄”：

- ② 东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问道：“你们这个十八兄，是何等人？”少年不答应……但高声吟曰：“杨柳桃花相间出，不知若个是春风？”……详他两句语意，是“李”字，况且又称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个为头的了。

明末也谓以“十八子”称李自成。姚雪垠《李自成》一卷下：

- ③ 这几年，风闻你一直跟着十八子，可甚得意？